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褚莹 学者的公益世界

■ 本报记者 张木兰

读小学时,褚莹就觉得自己长大会做个学者。因为他太喜欢看书了。2012年,褚莹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学术专著——《美国私有慈善基金会法律制度》。书的扉页上,他被这样介绍:男,1983年11月生,浙江湖州人,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学士、硕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管理学博士,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

“最开始学法,对美国的税法很感兴趣,而美国的税法其中很大部分是用来管理基金会;后来读博士研究英国的社会保障制度,里面提到很多关于基金会的问题,所以最后的研究领域就变成以基金会为核心,辐射到与其相关的法律、治理、募款、流程管理、宏观政策等等。”

2012年5月,由上海宋庆龄基金会、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和基金会中心网三家合作的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宋庆龄公益慈善教育中心成立,这是国内第一次从本科生开始定向培养公益领域专业人才。褚莹,被邀请授课。

课不多,两门——慈善史和慈善法,每月集中教学一个礼拜。那是褚莹最放松的日子,他喜欢跟学生们在一起,向他们传授自己的研究成果,听他们提出各种各样匪夷所思的问题。虽然夜晚睡在陌生的床上他总是失眠,白天却依旧精神抖擞。

没有课本,褚莹只能靠讲稿,这也是他最近忙的——把讲稿整理集结,出版做下学期学生的教材。下学期,他还要开设一门新课:基金会筹资。他已经想好了吸引学生们对此产生兴趣的方法——讲一个故事。

故事是这样的:说一位当教授的爸爸领着女儿去动物园,在动物园门口遇到了企鹅馆里的小丑。小丑告诉女儿在下午三点企鹅馆将举办表演,欢迎他们前来参观,小丑礼貌地问了小女孩的名字——凯莉。到了时间,父女俩如约而至。企鹅表演了一段时间后,小丑上台,说下面欢迎凯莉到上台来跟小企鹅互动。互动结束,小丑问凯莉,你愿不愿意领养它呀?凯莉很高兴,教授爸爸也没办法。从此以后,逢年过节,小企鹅过生日、小企鹅生宝宝……父女俩都会收到来自企鹅馆的募款倡议书,而女儿总是会想办法让父亲掏些钱出来。

“这就是成功的募款案例,有精准的募款对象和有效的募款方法。而当下国内基金会的募捐,则仍是以人际募捐为主,没有技术含量也没有形成市场。”“当然,没有市场也就说明市场广阔。”

有着强大辩证思维的褚莹脑袋里藏了许多“离经叛道”的看法。

比如,他认为当下国内关于基金会管理的法律制度相当不健全,却也不认同呼吁政府出一部大而全的《慈善法》。“在现阶段,法律不完善是有理由的。法律太完善了,反而会束缚公益机构的手脚,阻碍其发展。美国关于基金会的立法浩如烟海,在‘二战’后有一个集中立法的时期,可那时美国的基金会已经有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史。”

再比如,他绝对不能认同中国红十字会是法定机构的说法。“这里说的法定机构在我国是指有自己独立的法律,和国务院同级,只归全国人大管理的机构。这是什么概念?就是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制约它。我在一次开会时遇到过红十字会的领导,他们说自己有专门的国际条约,有三重赋权,不是一般的公益机构而是人道组织。国际公约太多了,许多国际组织都可以说自己三重赋权,靠这些理由就认定是法定机构,那法定机构多了去了。”

又比如,他甚至认为国内究竟应该由谁来管理慈善组织的问题都没有讨论清楚。“民政部门管理的好处是对口,便于统一管理。但缺点是不专业,慈善组织的管理要求非常专业,尤其是基金会偏向于税务管理,问题都在钱上、账上。美国的基金会监管机构就美国国内税务局一家,权责明确。”

2013年,褚莹三十岁。而立之年,他有N多规划:想找个温良顾家的老婆、想把工作敲定、想买个房、想出本书、想翻译点文章、想做几个项目、想参与几个调研……说这些时,善于联想的记者已经感觉天花乱坠,可他却仍不疾不徐:“我还年轻呢,正是踏实做事的好时间。再可能是因为喜欢看史书吧,读史让人沉静。”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办事处 倡导和信息管理助理项目官员 唐乐 让艾滋病感染者发声

■ 本报记者 王会贤

唐乐(Guy Taylor)最初参与到艾滋病教育和防治是在中国。在英国读完大学,因为对中国文化和语言感兴趣,唐乐来到中国。在学中文的同时,他跟一个社区组织的朋友在农民工学校做艾滋病教育,这影响到了他之后的选择。

回到英国伦敦经济学院读硕士时,唐乐选择了发展中国家公共卫生作为研究方向,读完后直接申请了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中国办事处的实习生,回到中国工作。唐乐说,这个专业的同学大部分都会到国外工作,而他自然最想回中国。

硕士就读期间,他到英国最大的艾滋病领域民间机构 Terrence Higgins Trust (THT)实习。在THT,唐乐看到了公民组织能够发挥的巨大作用。THT有比较典型的系统化工作流程,可以在各个层面发挥作用。除了为相关人群提供检测、咨询,帮助转接治疗机构等,他们还会关注领域内的新闻、动态和政策报道,分析其是否科学;收集相关数据、证据,通过各种渠道传达信息,影响政策的决策过程。同时,当政府在考虑制定涉及到性健康或艾滋病感染者人群权益的新政策时,也会主动征求他们的专业意见。

当然,产生这种影响的前提是机构本身的专业、透明做得非常好,掌握足够的资源,并且在资金、政策方面得到保障。唐乐说,在英国拿到募款资格比较容易,THT的大部分资金来自公开募捐,也有政府的购买支持。政府更愿意支持这些组织活动,“如果政府部门直接在社区开展艾滋病相关工作,可能缺乏亲和力,而民间组织更容易接触到这些人群。”

THT很大的作用是向政府反映来自艾滋病感染者人群的意见和看法。而它的工作人员,有许多本身就是艾滋病感染者或者相关人群,他们代表艾滋病感染者人群,为自己说话。

唐乐觉得公共卫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问题,公共卫生不仅是提供健康解决方案,很大程度上在关注社会问题,尤其是艾滋病领域,涉及到反歧视、社会组织的工作等等。UNAIDS在中国也支持了一些已形成的网络,如同志论坛、性工作论坛、中国抗艾滋病妇女网络等,这些社会组织变得越来越成熟,逐渐发挥更大的作用。民间组织可以提供很多实际

有用的信息,他们是这个领域最专业的。UNAIDS会定期与这些组织联系,也定期召开大型红丝带论坛等活动,请政府和民间组织共同参与。

为这些人群建立提出意见的渠道很重要。唐乐认为,不能只觉得艾滋病感染者是病人,单向地提供救助就可以。作为主体,艾滋病感染者和易感人群需要参与到防艾的过程、甚至相关政策的制定中,这样才能真正反映他们的需求。

近几年,中国有很多新政策出台,支持社会组织,为它们提供资金支持和开放登记。这两方面的问题如果能够解决,社会组织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否则,当工作人员都不明确这个组织明年还能不能存在、没有基本生活保障的时候,是很难把工作做好的。唐乐表示还并不确定目前正式登记的防艾组织具体数量,但与前几年相比,实际活动的已经多了很多。

唐乐在UNAIDS负责倡导和信息管理,制定宣传计划,组织活动,管理社交媒体等。他要收集国际艾滋病领域的信息、案例、最新动态,包括总部会定期发一些最新的报道和资料,还有来自其他联合国机构、全球的非政府组织的信息,将这些分享给国内的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确保它们可以获得权威的国际资料。

唐乐也很关注国内的消息,对于近日广东省教育厅发布的《教师资格申请人员体格检查标准(征求意见稿)》,将艾滋病列入不合格之列。唐乐认为,艾滋病在正常接触中是不会传染的,没有正当的理由限制他们的工作,这是一种歧视。在英国,艾滋病感染者是可以做手术医生的。

当然,他很理解有人反对艾滋病感染者做老师,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反应。人们也因为不太清楚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担心传染到孩子。而且很多人认为艾滋病有道德关联,但我们不能因为别人患上这种疾病而对他进行道德判断。另一方面,人们不了解歧视的危害,社会歧视会让很多人不愿意去做检测和获得药物,这无疑会起到反作用。